

## 胡適和儲安平抵制「標籤暴政」

● 盛 嘉

儘管胡適與儲安平在學識、性格和經歷上有很大的差異，但作為具有自由思想傾向的學者，他們卻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即對各種樣式的政治標籤都很敏感和警覺，並且在談學論政中盡量避免、甚至拒絕使用各種政治標籤。然而，他們卻恰恰生活在一個階級話語不斷地被構建和標籤泛濫的政治文化中。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期，無論是在中國的政治文化還是學術文化中，都充斥着中國社會所特有的一套階級話語和各類標籤，其中，「資產階級」一詞，就是一個被廣泛使用的標籤。

“Bourgeois”即「資產階級」，這一中性的、描述性的詞語，原見於歐洲的歷史語境中，於十九世紀末途經日本，隨着馬克思著述的譯介而傳入中國。在現代中國的社會歷史環境和特定的政治文化下，這一詞語同其他許多外來語一樣，經歷了一個中國所特有的階級化、政治化、抽象化的意識

形態變異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資產階級」這一歷史概念已經逐漸喪失了原有的一些內在基本要素，如時間性、地域性和對應性。它所承載的原始含義和性質均發生了變化，並已蛻變為一個極端政治化的名詞。在中國政治文化的階級和暴政語彙中，它被不加界定地廣泛使用，是一個最具殺傷力和摧毀性的標籤。

在階級話語被建構和標籤化形成的早期階段，只有少數知識份子敏感地覺察到這一現象，並且勇於站起來質疑和抵制這種危險的政治傾向。從1920年代起，中國就存在着一個不斷「泛資產階級化」的傾向和一個不斷抵制這一傾向的衝突。胡適與儲安平就是其中兩位值得注意的學者。

胡適是最早起來質疑和抵制這一傾向的少數學者之一。他反對不顧中國的實情，不加分析和界定地濫用「資產階級」這個外來詞，並隨意地生搬硬套於中國的社會階層的劃分。

1929年他在〈我們走那條路〉一文中指出，中國不應將所謂的「資產階級」設定為革命的對象，因為在當時的中國根本就沒有多少富人，不存在所謂甚麼「資產階級」<sup>①</sup>。

在這一點上，胡適與陳獨秀有很大的區別。在早期的階級話語建構過程中，陳獨秀極為賣力，他借用一些外來的詞彙，不加分析與界定就隨意用來劃分中國的社會階層，簡單武斷地圈出一個在當時中國幾乎不存在的所謂「資產階級」，並將其定為革命的對象。胡適對陳獨秀這一套做法頗為不滿。他批評道<sup>②</sup>：

獨秀先生們一面判決了封建制度的無罪，一面又捉來了一個替死鬼，叫做資產階級，硬定他為革命的對象。然而同時他們又告訴我們，中國「生產停滯，人口過剩，資本主義落後」，本國的銀行資本不過在一萬五千萬元以上。在一個四萬萬人的國家裏，止



胡適

有一萬五千萬元的銀行資本，資產階級只好在顯微鏡底下去尋了，這個革命的對象也就夠可憐了，不如索性開恩也宣告無罪，放他去罷。

儲安平在1940年代也意識到「泛資產階級化」的危險傾向，是當時質疑和抵制濫用「資產階級」標籤的少數知識學人之一。他反對把中國的知識份子武斷籠統地貼上「小資產階級」的標籤，指出這種做法脫離了中國的實情。1947年，在《觀察》雜誌上發表的〈中國的政局〉一文中，儲安平指出<sup>③</sup>：

今日一般知識份子，在共產黨心目中，他們都是「小資產階級」，但是實際上，今日中國的知識階級，除了極少數一些人外，大都已淪為「無產階級」了。

當儲安平質疑和抵制給中國知識階層貼上「小資產階級」的標籤時，相比之下，在延安的一些知識學人卻很少有人敢於抵制，甚至還心安理得地接受了這一標籤。他們當時可能鮮有人意識到，這恐怕是他們後來厄運的開始。

隨着1940年代末胡適流亡海外、1950年代中儲安平厄運的降臨，中國已經鮮有人敢於繼續抵制這種「泛資產階級」的「標籤暴政」。其實它已經超越話語霸權和修辭的範圍，而變成了壓制性體制下的一種工具。這種隨意把知識階層貼上「資產階級」標籤的做法，在1950年代以後變得更加嚴重，在1960至70年代更是登峰造極。

根據美國社會學者亞歷山大（Jeffrey C. Alexander）的觀察，在一個極權和極度政治化的社會中，當權者



儲安平

往往以這種壓迫性的話語來確定反對和壓制的對象。壓迫話語的應用，最終創造出一個先前並不存在的客觀實體<sup>④</sup>。1957年「反右」的疾風暴雨，瞬間造就了五十多萬「資產階級右派」。這是儲安平始料所不及的。「資產階級」標籤隨意地被使用以及由此所造成的嚴重的社會後果和歷史效應，是二十世紀中國政治文化慘烈的一幕、一個令人痛心的現象。

儲安平可能沒有想到，他所質疑和抵制的「資產階級」這一標籤，後來在1957年也無情地、粗暴地貼到了他自己的身上。更令人心酸的是，在殘暴的特定的政治強壓下，他不得不寫下了〈向人民投降〉這篇文章，違心地給自己貼上了他當年所抵制的「資產階級」標籤<sup>⑤</sup>。從質疑、抵制和拒絕，到無奈和被迫給自己貼上這一不實的「資產階級」標籤，這不只是儲安平個人的悲劇，更是二十世紀中國政治文化的反諷和悲劇。

今天，若以歷史的眼光來審視胡適和儲安平的做法，人們不得不佩服他們當年的敏銳、勇氣和遠見。但如果當時有更多的人認同他們的理念，加入到他們的行列，同他們一樣，自覺謹慎地抵制各式各類的標籤，不給自己貼標籤，也不隨便給別人貼標籤，那麼後來中國「標籤暴政」的出現是否可以避免？或者至少可以在規模和範圍上得以適度的控制？

時至今日，儲安平仍然下落不明，但「資產階級右派」的標籤還確切地貼在他的身上。現在是不是到了該把這個標籤從他身上摘掉的時候呢？

#### 註釋

①② 胡適：〈我們走那條路〉，載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四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頁458；467。

③ 儲安平：〈中國的政局〉，《觀察》，1947年第2卷第2期，頁6-8。

④ Jeffrey C. Alexander, "Citizen and Enemy as Symbolic Classification: On the Polarizing Discourse of Civil Society", in *Cultivating Differences: Symbolic Boundaries and the Making of Inequality*, ed. Michele Lamont and Marcel Fournier (London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289-308. 中譯文參見鄧正來、亞歷山大 (Jeffrey C. Alexander) 主編：《國家與市民社會——一種社會理論的研究途徑》（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頁197-214。

⑤ 儲安平：〈向人民投降〉，《人民日報》，1957年7月15日。